

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高江涛)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存是欧亚草原一支十分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材料虽然零乱,但却分布广泛,影响深远,被称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¹。长期以来,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一直是学者们不间断的关注对象,尤其近些年随着浙川下王岗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新发现以及切尔内赫相关研究专著中译本的出版,很多学者如林沅、邵会秋、杨建华、林梅村以及日本学者高滨秀、松本圭太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²,掀起了新的研究浪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多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泛泛而谈,尤其对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这一既典型又特殊的器物均是点到为止,缺乏专门全面的论述,笔者自从2009年在浙川下王岗发掘此类铜矛之后,一直在关注与思考这一问题。本文拟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作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发现简况

一般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阿尔泰山兴起,随之沿欧亚大陆的主要河流广泛传播,东起萨彦-阿尔泰,向西经乌拉尔山,甚至伏尔加河流域的芬兰和摩尔多瓦。最重要的是,该文化遗存同时大举南下进入中国新疆、甘肃、青海,并以此为中转改造继续东渐影响中原地区。之所以有如此认识,就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大都发现了赋有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存特色的倒钩铜矛,不妨称之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

依据最新资料与研究成果,此类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迄今发现于青海、陕西、山西、河南四省,凡13件。

1992年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出土1件³。矛叶呈阔叶形,中起棱脊,矛前缘略弧,矛铤较长,骹口端有三圈箍,并附有钮,矛叶与骹管相接的骹壁一侧带有曲状倒钩。该铜矛尺寸硕大,骹内有木秘残迹,通长约61.5,宽约19.5厘米(图一:1)⁴。此类矛通常被称为阔叶倒钩铜矛。另外,据林沅先生言在青海大通县博物馆也藏有1件采集到的同类矛⁵。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1件。资料最早见于《苏联考古学》,1959年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访问中国时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并回国后公开发表⁶,之后国内多位学者有所提及⁷。据线图看,该铜矛形制特征与沈那铜矛基本相同,只是尺寸较小,通长36.0厘米。值得注意的是,铜矛骹口端的钮多认为是双联钮。最近,据胡保华实地仔细观摩,发现实际是受外力弯曲变形的片状单钮⁸(图一:2)。

¹ [俄]E.H. 切尔内赫、[俄]C.B. 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原书俄文著于1989年。

² 下文论述中会涉及诸学者的相关看法,此处不再一一注释。

³ 王国道:《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60-261页。此处公布铜矛长62厘米,宽20厘米,尺寸与下《青海文物》公布数据有细微差别。

⁴ 《青海文物》编辑部:《青海文物》总第8期,封三:1,1994年。

⁵ 林沅:《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⁶ С·В·Киселев: 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Кит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1960, No4, 图8:26。

⁷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⁸ 胡保华:《试论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的年代、性质与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待刊

山西省目前发现有 2 件此类铜矛，这 2 件铜矛的流转情况有点复杂，最近据林梅村先生撰文终于弄清了历程¹。1979 年太原铜业公司拣选出 1 件，后入藏山西省博物馆，这件铜矛正是学者们文中经常提到者²。1973 年从太原市电解铜厂也抢救出 1 件，此件同样入藏山西省博物馆。之后，山西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并更名为山西省博物院，前一件转入山西省工艺美术馆收藏，后一件仍留山西省博物院。

山西工艺美术馆藏铜矛，圆锋阔叶，中起棱脊，骹根部饰三周凸弦纹，并附有钮，叶与骹相接的骹壁一侧带倒钩，倒钩一面为弧形，一面为平面，倒钩与单钮在同一侧。通长约 34.6、叶宽 10 厘米，骹口直径 2.9 厘米；倒钩残长 1.6、宽 0.8 厘米（图一：3）。

山西省博物院藏铜矛形制特征与山西工艺美术馆铜矛基本一致，只是器形稍大一点，倒钩与钮均残断，倒钩也是一面为弧形，一面为平面，显示铸造时只在上面的范上刻了槽。通长 36.3 厘米，最宽处约 12.8 厘米，骹口直径约 3.2 厘米（图一：4）³。

河南省境内发现的此类铜矛应为 8 件，其中 4 件发掘出土了浙川下王岗遗址，3 件入藏南阳市博物馆，1 件藏于安阳博物馆。浙川下王岗 2008T2H181 出土了 4 件此类铜矛（图一：7、8），形制大小基本一致，阔叶圆锋，叶中起脊，骹口端饰三周凸弦纹，并附单钮，叶与骹相接的骹壁一侧带弯曲状倒钩，倒钩与钮不在同一侧。其中一件长 37.0、宽 12.5 厘米（图一：7）。南阳博物馆所藏 3 件铜矛是 1979 年从废品公司收购，与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形制特征相近，三件大小不完全相同，骹管范痕清晰，未经打磨显得粗糙，两件钮残（图一：9）。钮与倒钩的相对位置有差异，两件钮与倒钩分在两侧，一件钮与倒钩在同侧⁴。安阳 1 件倒钩铜矛出土于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 M33 墓葬填土中，长 27.1 厘米，矛叶最宽 4.7 厘米⁵。此件铜矛与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差别较大，矛叶较窄，中间无脊，而是骹管从口端起由粗变细直通至锋尖，骹口处两侧各饰一环形钮，骹与叶相接处的倒钩显得粗大且长，长达 5.7 厘米，以致发掘者称之为铜戟。（图一：6）。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件，李刚先生著作中有转引⁶，具体出土资料信息不详，形制特征与浙川下王岗相同，通长约 37.9 厘米（图一：5）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1989 年在辽宁朝阳南双庙（王八盖子地）征集到 1 件阔叶铜矛⁷，通长约 33.7 厘米，宽约 9.7 厘米（图二：1）。除了未见倒钩外，器物其他特征与常见阔叶倒钩铜矛基本一样。浙川下王岗在 20 世纪 70 年的发掘中一些残铜器也值得注意，报告认为的西周铜矛 T19①：158，残甚，仅余骹部，但在骹根部一侧有单钮⁸（图二：2），是否还有三周凸弦纹，不得而知，若有的话，就不排除是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可能性。另外，在报告认为的属于二里头三期的 T15②A：39 残铜钩⁹（图二：3），又似乎很像此类铜矛的倒钩，此铜钩横截面是菱形，而下王岗 4 件铜矛中就有 1 件倒钩两面皆起脊，截面近菱形，

¹ 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第 658~679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² 太原铜业公司编：《沧海遗珍——太原铜业公司拣选文物荟萃》，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 年，第 18、119 页。林云：《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 年第 1 期。

³ 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下册第 666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⁴ 2010 年春，笔者受南阳市博物馆尹俊敏先生相邀，在馆库房观摩了此三件铜矛，相关资料暂未公开发表，可参见刘霞、胡保华：《南阳市博物馆藏倒钩铜矛及相关问题探讨》，《江汉考古》，待刊。

⁵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 年殷墟考古报告）》，第 132 页，图版五十二：4，科学出版社，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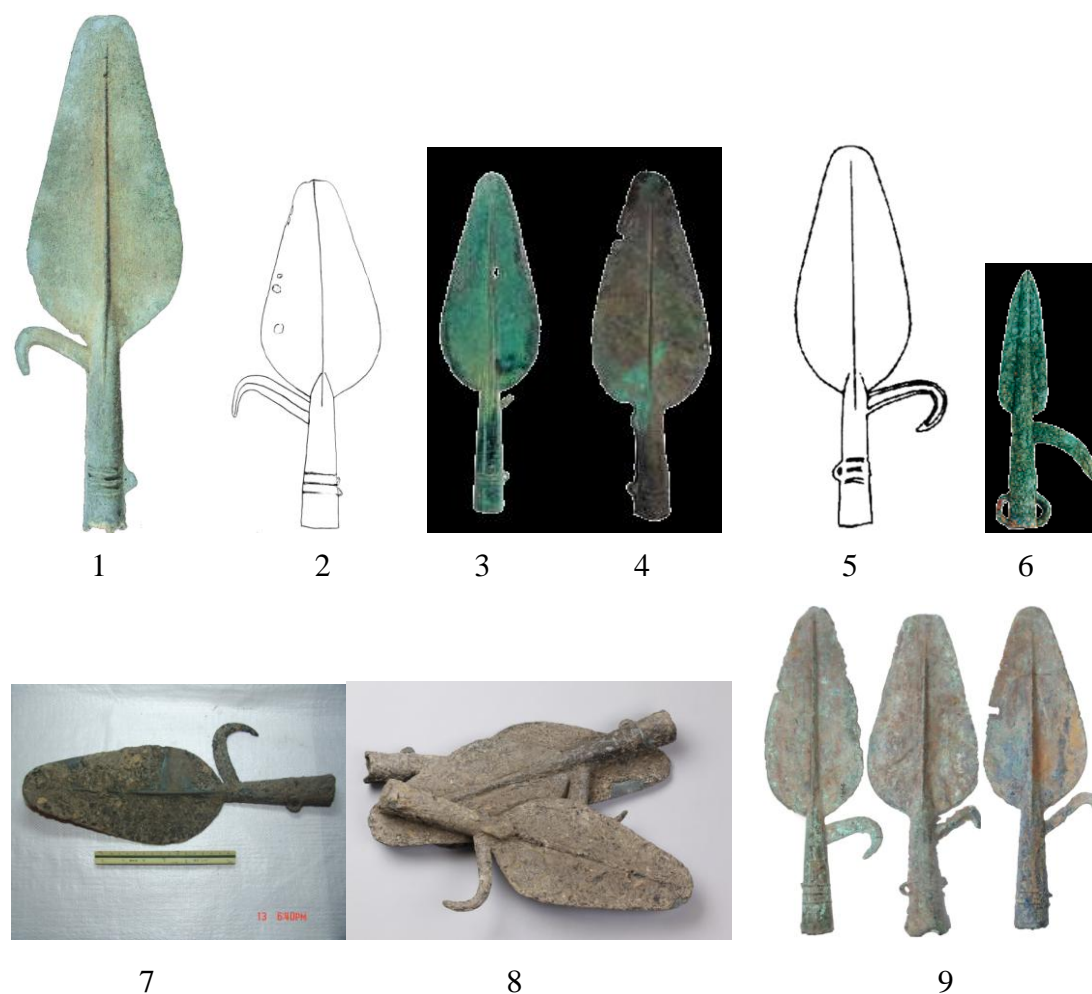
⁶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第 91 页图 3.3-8：10，文物出版社，2011 年。

⁷ 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第 24 页。该件铜矛的图源于胡保华一文。

⁸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第 315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⁹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第 299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二者截面也相近。因此，也不排除即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倒钩的可能性。



图一、中国境内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¹

1、青海西宁沈那（Ab型）2、陕西省历史博物馆（Ab型）3、山西工艺美术馆（Aa型）4、山西省博物院（Ab型）5、中国国家博物馆（Ab型）6、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M33（B型）7、8、河南淅川下王岗H181（Ab型）9、河南南阳市博物馆（Ab型）

¹ 图一：2、9由胡保华绘制与拍摄。



图二、与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密切相关的铜器¹

1、辽宁朝阳南双庙 2、浙川下王岗 T19①：158 3、浙川下王岗 T15②A：39 4、俄罗斯的外贝加尔（ZABAYKAL）边疆区东部²

二、类型与比较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至少有 15 件，资料以各种形式简单公布的有 13 件。出土品 6 件，余皆收藏品。此类铜矛分布零散，又多收藏品，同是发掘品的也是只同出一个灰坑，各铜矛之间连简单的相对早晚的打破关系都不存在。故此类铜矛的类型学划分比较简单，可分大的“型”，却不易进一步分早晚延续的“式”。从整体上看，此类铜矛均属于以骹管纳秘的骹式矛，其主体由骹（鏃）与叶两大部分组成。这 13 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依据骹与叶结构的不同可分为两型。A 型：骹管与叶底部相接，叶与骹为上下结构。B 型：骹管（鏃）直通叶的锋尖，叶与骹为左右结构，有学者称之为“透尖矛”³。很明显，13 件此类铜矛中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 M33 出土铜矛属于 B 型，余皆属 A 型。此外，单就中国发现的 13 件铜矛而言，A 型与 B 型的矛叶也有一定的差别，A 型为阔叶，B 型为窄叶。

这样，此件 B 型铜矛数量仅一件，显得有些异类。值得注意的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中也未见此类带倒钩的“透尖矛”。如果不是还未发现的原因的话，那么可以说安阳的这件矛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但在今俄罗斯的外贝加尔（ZABAYKAL）边疆区东部⁴却发了一件与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 M33 铜矛形制特征相近的铜矛，骹管直通叶的锋尖，叶面较窄，带倒钩，只是其倒钩短小，不似安阳出土铜矛倒钩粗长，是否有组不详（图二：4）。二者形制相近，时代应该相近，或许有着一定的流传关系。

A 型矛依据骹管与叶根相接处的叶脊是否分叉，可细分为二亚型 Aa 与 Ab，这一点十分重要，直接涉及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铜矛的特征比较，下文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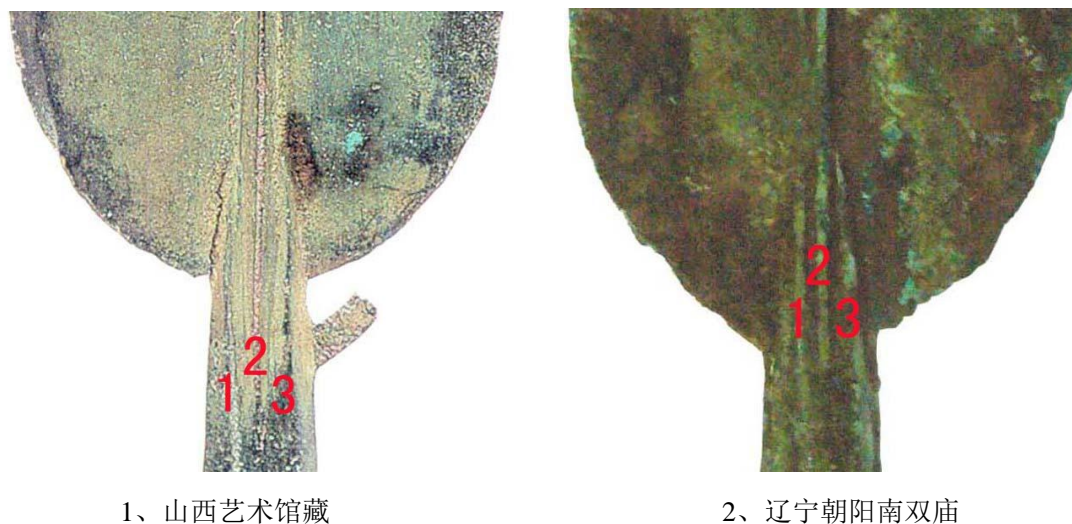
¹ 图二：1 辽宁朝阳南双庙（此图由胡保华绘制）。

² 高滨秀：《前 2 千年紀前半の中央ユーラシアの銅器若干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叢書 3》，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2000 年，第 122 页。日本学者高滨秀先生在《丝绸之路学研究丛书（3）》中提到在ザバイカリエ（ZABAYKAL）东部见有此件铜矛，并配有图。

³ 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

⁴ 高滨秀：《前 2 千年紀前半の中央ユーラシアの銅器若干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叢書 3》，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2000 年，第 122 页。日本学者高滨秀先生在《丝绸之路学研究丛书（3）》中提到在ザバイカリエ（ZABAYKAL）东部见有此件铜矛，并配有图。

Aa 型，骹管与叶根相接处的叶脊分叉，此型矛除了中脊直达叶尖外，中脊根部两侧各有一条短脊，形似两条指向叶尖的短刺，三条脊组合形似“山”字，所以被称为“分叉式矛”，因多出土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址，或径称为“塞伊玛分叉式铜矛”¹。也被称为“山字脊矛”²。12 件 A 型铜矛中，山西工艺美术馆藏铜矛属于此型，骹管与叶根相接处明显可见分叉（图三：1）。值得注意的是，不带倒钩的辽宁朝阳南双庙铜矛却也明显见有此类分叉（图三：2）。



图三、Aa 型的三条分叉脊

Ab 型，骹管与叶根相接处的叶脊不分叉，仅见有中间一道凸脊。青海西宁沈那、河南浙川下王岗发掘出土以及山西省博物院、陕西省博物馆、河南南阳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等 11 件倒钩铜矛均为 Ab 型（参见前文相应图）。中国境内所见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以此型为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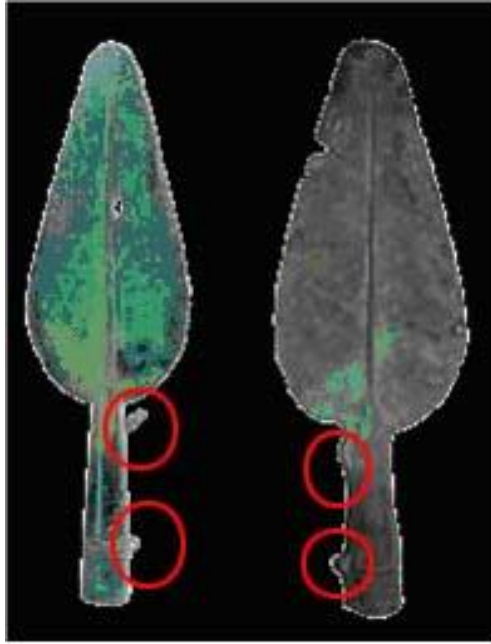
此外，对于这 12 件 A 型铜矛还有一个细微的不同之处，就是倒钩与钮的相对位置有差别。有些铜矛倒钩与钮在同一侧，有的二者异侧。南阳博物馆三件中的编号 0234、山西省博物院、山西省工艺美术馆三件铜矛倒钩与钮在同一侧（图四），余 9 件铜矛倒钩与钮均在不同侧。南阳三件铜矛据材料来源看也像浙川下王岗一样应为同一单位出土，2 件倒钩与钮在异侧，1 件在同侧，可见钮与倒钩相对位置并没有统一的规制，这种差别不是器物类型上的差别，不应作为类型区分的关键之处。

¹ [俄] E.H. 切尔内赫、[俄] C.B. 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 年。

² 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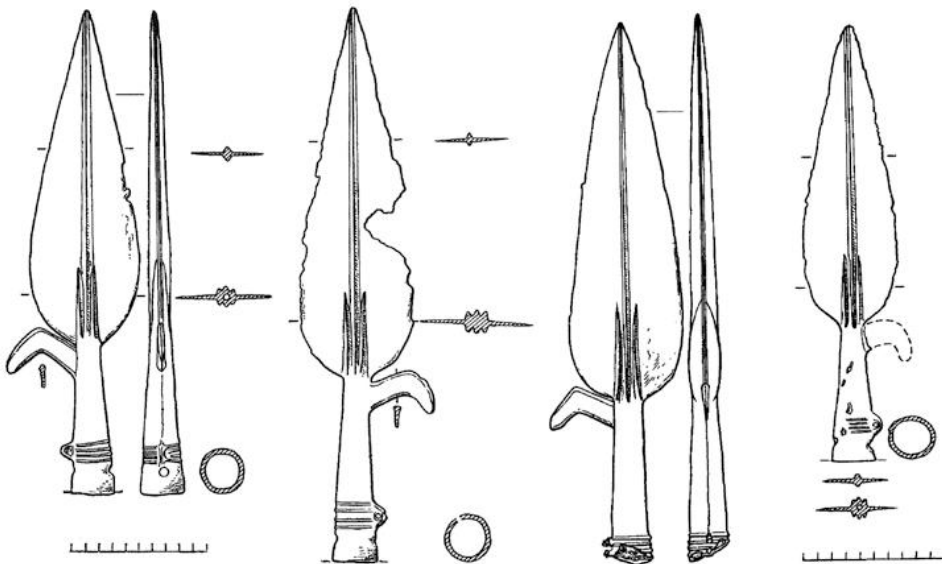
南阳博物馆 0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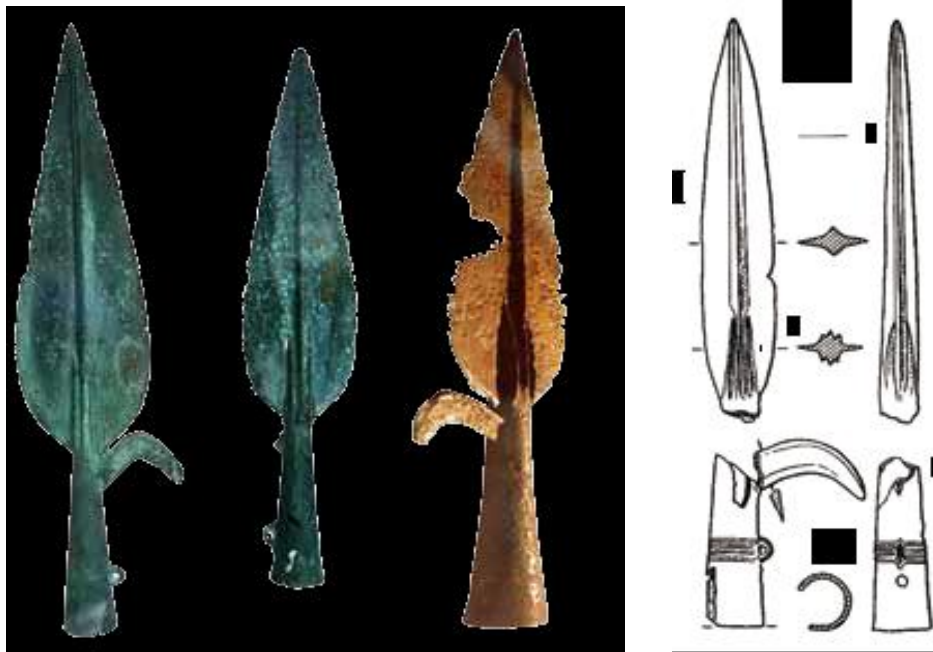


山西省工艺美术馆与山西省博物院

图四、倒钩与钮同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

中国境内的此类铜矛与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矛在形制特征上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最大的不同有三：一是叶锋，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叶锋尖锐，而中国境内A型同类矛的叶锋圆钝，无锐尖。二是，骹管与叶根相接处的叶脊，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此位置叶脊呈“山”字形分叉，而中国境内同类矛除了山西工艺美术馆1件外均无明显分叉。三是，倒钩与钮的相对位置，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的倒钩与钮均在同侧，统一规制，而中国境内此类铜矛前文已言，倒钩与钮不统一规制，分在同侧与异侧均有。





图五、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¹

经此比较可见，目前中国境内所有此类铜矛均是圆弧形钝锋，不似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叶锋尖锐犀利。从这一点上看，若作为武器，中国境内此类铜矛似乎不是具有明显杀伤力的武器，至于功用推测详见后文。

此外，目前中国境内所有此类铜矛中只有山西省工艺美术馆入藏的铜矛既有分叉山形脊，又是倒钩与钮同侧，在形制特征上最为接近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

三、年代问题

中国境内的此类铜矛是与欧亚草原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结果，要讨论这些铜矛的年代问题就不得不先讨论一下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问题。

一般认为，在南西伯利亚，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上接奥库涅夫文化，而略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然而，早年遗存以墓葬为主，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多，以致其绝对年代一直有不同意见。1959年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C. B. Kiselev)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院学术报告中将塞伊玛文化与安阳商文化遗物相比，提及塞伊玛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相当，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1300年²。

1992年俄罗斯冶金史专家切尔内赫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大体定在公元前16/15至前14世纪³。有意思的是，同年俄罗斯考古学家吉鲁森(Y. E. Kirushin)首先提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起源于阿尔泰山，推定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00年—前1700年⁴。二者对年代的判断差别巨大，后者开始将其年代提前。1995年，美国学者胡柏(Lousia G. Fitzgerald-Hubert)在讨论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时又将其年代向前推到了公元前2千纪初⁵。

¹ 此图引自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下册第662~663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² 吉谢列夫，阮西湖译：《C.B.吉谢列夫通讯院士在北京所做的学术报告》，《考古》1960年第2期。

³ E. N.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Translated by Sarah W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94.

⁴ 转引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下册第65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⁵ Lousia G. Fitzgerald-Hubert: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istant Culture*. Early

进入 21 世纪,有关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年代争论更加激烈,中国学者开始较多的参与讨论。2010 年 7 月出版了中译本《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一书,书后所附切尔内赫研究论文又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阿巴舍沃-辛塔什塔文化互有接触与交流,从而借用阿巴舍沃-辛塔什塔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 2200 年—前 1800 年或公元前 1700 年¹。然而,这一推断受到了中国学者的质疑,2011 年邵会秋、杨建华撰文认为单纯依靠碳十四测年的年代判定容易偏差,加之将测年提前的数据是源于阿巴舍沃-辛塔什塔文化遗址,而非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存本身,其年代推定确实太早,相比之下,俄罗斯学者早期研究成果要更加可信,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主要流行年代还应在公元前 16—前 15 世纪,而形成期或许要稍早一些²。

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公布了俄罗斯乌拉尔山的峡坦亚(Shaitanskoye)遗址,该遗址是一处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并与冶金有关的重要礼仪性遗址,其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 19—前 18 世纪³。

考虑到乌拉尔山地区并非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发源地,其形成时期应该较此更早一些。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晚期又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有一定交际。有鉴于于此,我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应在公元前 2000 左右—前 1600 年,其盛行期大致在公元前 1900—前 1700 年。

中国境内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严格意义上的发掘出土品只有西宁沈那矛和浙川下王岗矛。沈那铜矛据发掘材料称出土于“晚期的灰坑内”,材料公布者认为是属于齐家文化的晚期灰坑。但在 1997 年中国文物精华展的图录上,此矛却被标注为“齐家文化至卡约文化(约公元前 20~前 11 世纪)”⁴。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引起了学者们对其属于齐家文化遗存的怀疑,以致后来多有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观点,即或认为属于齐家文化时期,或认为属于卡约文化⁵。前文已述,此铜矛属于欧亚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的遗物,齐家文化间接或直接的受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影响,铜矛并非孤例,齐家文化中的其他铜器如甘肃岷县杏林遗址⁶出土的单耳空首斧和有柄弧背刀都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器相似,被认为是齐家文化受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也逐渐被学者们所共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此铜矛还应属于齐家文化时期的铜器。

齐家文化绝对年代的碳十四数据十分有限,可直接参考的有 6 个⁷(下表)。

遗址名称	标本单位	样品编号	高精度校正年代
桥村	H14	ZK0741	公元前 2183~前 1979
西山坪	T1③	ZK2149	公元前 2140~前 1529
	T10F1	ZK2205	公元前 2138~前 1906
大何庄	F7	ZK0015	公元前 2114~前 1777
	F7	ZK0023	公元前 2030~前 1748
柳湾	M392	ZK0347	公元前 1970~前 1630

齐家文化遗址众多,但没有一个遗址进行过长期不间断的连续发掘,目前还未见到任

China,(20), 1995,P18~65.

¹ [俄]E.H. 切尔内赫、[俄]C.B. 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第 251-268 页,中华书局,2010 年。

² 邵会秋、杨建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空手斧的传播》,《边疆考古研究》第 10 辑,科学出版社,2011 年。

³ 转引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下册第 661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⁴ 《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图 38,文物出版社,1997 年。

⁵ 参看高江涛:《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 年 3 月 6 日第七版。

⁶ 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5 年第 11 期。

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 53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何一个遗址存在碳十四的系列测年数据，齐家文化的年代也只能据目前数据判断大概。从上表看，数据年代上限差别不大，多集中于公元前 2100 左右，下限差别较大，最晚的一组是公元前 1529，似乎有些偏晚。最近，在临潭磨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齐家文化晚期墓葬，但还未见碳十四测年数据公布。值得注意的是，公布了一个属于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过渡性质的墓葬 M633 的测年数据，样品为人骨，测年为距今 3145 ± 45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 1510 至前 1300 年¹。这样，齐家文化的年代下限应该不晚于这一数据，有鉴于此，齐家文化的年代范围主要是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至前 1600 年左右。

有学者在论述齐家文化铜矛时，往往仅把铜矛置于一个平面的齐家文化年代，而忽略了齐家文化前后历时 500 年左右。换言之，齐家文化铜矛属于齐家文化的哪一个时期呢？齐家文化分期主要有四期说²、三期八段说³、四期六段说⁴、三期说⁵等等。无论哪一种看法，本本文所言齐家文化铜矛及相关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的空首斧和弧背刀都是属于齐家文化晚期阶段遗物。王振专文对齐家文化出土的铜器进行了梳理与系统分析，认为齐家文化可以分为早晚不同的 A、B、C 三组，其中 C 组铜器形制复杂，以环首刀、人面匕首和带耳空首斧为主，铸造技术要求已相当高，带耳空首斧是由多块范合铸而成，年代定在齐家文化三期 7、8 段左右⁶。本文所言的铜矛及相关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的空首斧和弧背刀显然就是属于其所言齐家文化晚期的 C 组铜器。

因此，我们推断齐家文化铜矛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 1800 至前 1600 年的范围内。

浙川下王岗铜矛发现于 2008XWGT2H181，H181 层位关系明确，开口于属于西周中期④B 层下，打破龙山晚期文化地层，出土遗物除 4 件铜矛外，还有少量的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陶片，陶片零碎，难以明确器形。可见，H181 的相对年代是不晚于西周中期，不早于龙山文化晚期，年代相当宽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H181 可以明显的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近窄长方形的常见灰坑，而上层是由红烧土块和硬土块组成的层，4 件铜矛出土于下层。整个 H181 应是有意挖成掩埋 4 件铜矛，并用红烧土及硬土块加固封实。因此，H181 不是一个逐渐长期形成的垃圾坑，而应是一时短暂形成的埋藏坑。这样，H181 又只能是宽泛地层年代中的某一个具体时期或阶段。浙川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到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有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时期、西周时期三个阶段，未见商文化遗存。依据前文所言，此类铜矛晚至西周时期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能是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某一个阶段。2008 年南水北调工程下王岗遗址进行了三年的连续发掘，新的发掘表明下王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是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阶段开始，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结束。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时期也是一个非常繁盛且历时较长的阶段，其晚期自然延续时间很长，以致有学者在初期发掘时将该遗址龙山文化末期的遗存称之为进入“新砦期”的文化遗存，上个世纪 70 年代发掘认为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物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存。“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末期遗存”在文化性质上明显不属于“新砦期”遗存，但在文化年代上自然延续至相当于“新砦期”这一阶段。

另外，在丹江上游的高洛发现的“东龙山文化”一类遗存⁷，很多学者注意到与齐家文

¹ 陈建立等：《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 年第 8 期。

² 谢端琚：《论大何庄与秦魏家文化的分期》，《考古》1980 年第 3 期。

³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 年第 1、2 期。

⁴ 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⁵ 张天恩、肖琦：《川口河齐家文化陶器的新审视》，《中国考古学研究——庆祝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 361-367 页，三秦出版社，2004 年。

⁶ 王振：《从齐家文化铜器分析看中国铜器的起源与发展》，《西部考古》第 3 辑，三秦出版社，2008 年。

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2012 年。张天恩：《关中东部夏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国历史文物》2009 年第 1 期。

化关系密切，甚至径直称之为齐家文化遗存¹。最近，有学者更具体指出就是部分齐家人东迁至丹江上游商洛东龙山遗址²。在下王岗遗址发现的双耳罐和绳纹罐也具有东龙山文化的特点³。因此，不排除齐家文化通过丹江上游东龙山文化影响到丹淅流域的下王岗遗址。恰恰下王岗和齐家文化都发现了此类形制相同的铜矛，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下王岗铜矛与这一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推测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年代应该属于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末期。绝对年代有待碳十四测年的公布，并加以印证。

总之，属于 Ab 型的这 11 件铜矛，形制特征基本一致，年代也应相近，推测年代上属于齐家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末期阶段，绝对年代大概在公元前 1800 年—1600 年之间。而 Aa 型的山西省工艺美术馆入藏的铜矛年代或许稍早于此。

四、传播与路线

史前考古学文化间的传播或言互动交流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跨越地理空间、跳跃式的文化传播或接触是不切合考古实际的。作为文化载体的典型器物在另一个文化中较多的出现，显然是文化间互动交流与渐进传播的结果。本文所言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分布地域与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之间即使是其最西北的青海西宁沈那及大通县也相隔河西走廊、新疆地区。那么就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新疆地区有无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存？二是若有，是怎么传入新疆地区并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及相邻地区的？

从新疆地区的考古资料看，迄今新疆地区虽未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却见有较多的其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我们不妨自东向西的简单梳理一下。与河西走廊紧密相连的就是哈密地区。哈密地区天山北路墓地墓葬中发现的环首弧背铜刀、套管空首斧（透釜斧）等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器相近⁴，亦与前文所言齐家文化所出有柄弧背刀及空首斧形制基本相同。林沅先生也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这类套管式釜斧源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⁵。关于天山北路墓地的看法不一，吕恩国等先生把墓地分为四期，年代范围为公元前 19—13 世纪⁶。李水城先生认为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与四坝文化基本相同，在公元前 2000 年至 1500 年⁷。天山北路墓地与四坝文化关系密切，年代应有大体交错，吕恩国等先生因将墓地出土铜镜与殷墟妇好墓铜镜等同，自然年代偏晚至 13 世纪，李水城先生就将墓地年代晚期向前提至 15 世纪。从吕恩国等先生公布的分期材料看，弧背刀基本出土在年代偏早的第一、二期墓中，而将透釜斧墓葬分在了其第三期，此二类铜器应该同属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遗物，年代应大体同时。因此笔者以为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弧背刀和透釜斧应属于其偏早阶段，或可当在公元前 1900~1800 左右。

哈密地区向西的昌吉地区也发现有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的弧背铜刀、套管空首斧及其石范⁸。铸造套管空首斧石范的发现很可能表明了此类遗物为本地制造，或者说发

¹ 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 年第 1 期。

² 陈小三：《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第 170 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12 月。陈先生对东龙山文化含有齐家文化等因素的论述可以为信，但对于这些文化因素的出现年代的判断有偏晚的倾向。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内部资料。

⁴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第 182~183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⁵ 林沅：《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道路》，《草原文物》2011 年第 1 期。林沅先生虽然认为此类铜器源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但限于材料却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是在公元前 16—14 世纪。

⁶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第 182~183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⁷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⁸ 参见林梅村、刘瑞、高江涛等：《中国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合金成分》，《文物》待刊。2012 年林梅村先生在其论文《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也提到昌吉博物馆的石范。

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遗物很可能非直接舶来品，而是技术引进吸收并简单加以改造，本地铸造出的此类器物，前文倒钩铜矛形制上与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相近，但同时又存在一些明显不同之处，这种情况也反映了这一点。

昌吉地区再向西的阿尔泰、塔城、伊犁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史前时期铜器中也见有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的铜器。塔城三道河坝 92TS: 1 套管空首斧（透釜斧）¹在形制上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器相近。阿尔泰、塔城、伊犁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这些早期青铜器一般被认为具有浓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或者包含较早的因素²。但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件塔城透釜斧的特殊之处，龚国强先生将新疆地区此类有釜斧进行了型式划分，称这件为“桥形釜斧”³。林沅先生称之为套管式铜铍，并认为显然不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器物，而是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铜器⁴。近年，林梅村先生认为在阿勒泰市和布尔津县发现古墓中的石棺墓 M12 和 M15 不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古墓，而是塞伊玛-图尔宾诺古墓⁵。无论如何，新疆最西北的塔城、伊犁及周边地区发现有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新疆发现的这些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是如何传入的呢？近些年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南西伯利亚阿凡纳谢沃文化时期或更早，该文化经阿尔泰山大举南下，开拓了进入新疆地区的天山廊道。有学者更直接指出公元前 2000 年前后，来自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或中亚哈萨克斯坦一带的族群曾沿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陆续进入新疆西北地区，其中少部分向东迁徙到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一带⁶，论文提及了进入新疆地区的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等三条河流通道。林沅先生更加详细的论述了沟通新疆和欧亚大草原的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这三条河谷形成的天然通道，并且也认为北疆的这三大河谷与西北方的交通，在公元前二千纪或更早就已经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了⁷。可见，尽管学者们对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如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等等的年代与分布有着差别较大的不同认识，但却都基本认同在公元前二千纪或更早时期，这些文化就已经通过上述天然通道进入新疆地区了。前文已述，我们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应在公元前 2000 左右—前 1600 年，其盛行期大致在公元前 1900—前 1700 年，此时该文化与新疆地区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因此，我们推测大概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通过上述所言河谷等天然通道传播，开始进入新疆地区。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传入新疆地区后，文化因素继续循序渐进的向东传播，经河西走廊以及齐家文化的“中介”作用，进而大致在公元前 1800 年—1600 年之间传入中原及相邻地区。从目前考古资料看，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经新疆地区、河西走廊传入后，文化因素继续东传至少存在南、北两条路线。目前来看，基本上是以今长城地带为界，长城地带及以北为北线，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方系青铜器”⁸或者“中国北方青铜器”⁹所在地域；长城地带以南为南线，主要是通常所言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区。关于北线，林沅先生撰文认为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一批喇叭形耳环、套管式铍等早期铜器是从中亚并经新疆影响到中国北方地区的¹⁰。最近，他又更具体的指出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的此类套管式铍，通过河

¹ 李肖、党彤：《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新疆文物》1995 年第 2 期。

²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³ 龚国强：《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略论》，《考古》1997 年第 9 期。

⁴ 林沅：《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道路》，《草原文物》2011 年第 1 期。

⁵ 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下册第 674~675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⁶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⁷ 林沅：《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道路》，《草原文物》2011 年第 1 期。

⁸ 林沅：《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年；《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⁹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第 5 页，文物出版社，2011 年。

¹⁰ 林沅：《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学研究》第 1 集，科学出版社，2002 年。

西走廊东传到中国北方草原的鄂尔多斯¹。李刚先生在探讨欧亚草原及西亚青铜东传路径时，也认为存在天山北麓至河西走廊，再至鄂尔多斯，甚至辽河流域的路线问题²。我们注意到，这一路线铜器的传播很可能是以齐家文化东传为媒介的，在黄河中游河谷沿线内蒙古阿拉善旗鹿图山遗址³、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⁴等含有齐家文化因素陶器出土，很可能反映的正是这一路线上随齐家文化东传的聚落点。若然，不排除太原所见 2 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即是经过这一路线传播而至的可能性。关于“南线”，学者们有较多提及，一般认为河西走廊向东，经泾渭进入关中盆地，继续向东进入中原腹地，或者在关中南下，经丹江、汉江可至长江中游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中西部陇县川口河⁵、关中西安老牛坡⁶、关中东部商洛东龙山⁷、丹江下游浙川下王岗⁸等与齐家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遗址正是这条路线上的自西向东的关键聚落点。同样，不排除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是经此路线随齐家文化东传而至的。

因此，我们推测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经天山北麓三大河流通道进入新疆，向东传播，经河西走廊中转，以齐家文化为中介，逐渐作为文化因素的代表器物继续向东影响，北达晋陕高原包括鄂尔多斯地区，东南经关中以至中原腹地及丹江流域（图六）。而且，这种文化的传播或影响是循序渐进的，大体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进入新疆西北地区，持续东渐，约公元前 1800 之后开始逐渐进入中原及相邻地区，包括丹浙流域。

¹ 林沅：《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道路》，《草原文物》2011 年第 1 期。林沅先生虽然认为此类铜器源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但限于材料却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是在公元前 16—14 世纪。

²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第 255 页，文物出版社，2011 年。李刚先生对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年代的判断与笔者不同。

³ 齐永贺：《内蒙古白音浩特发现的齐家文化遗物》，《考古》1962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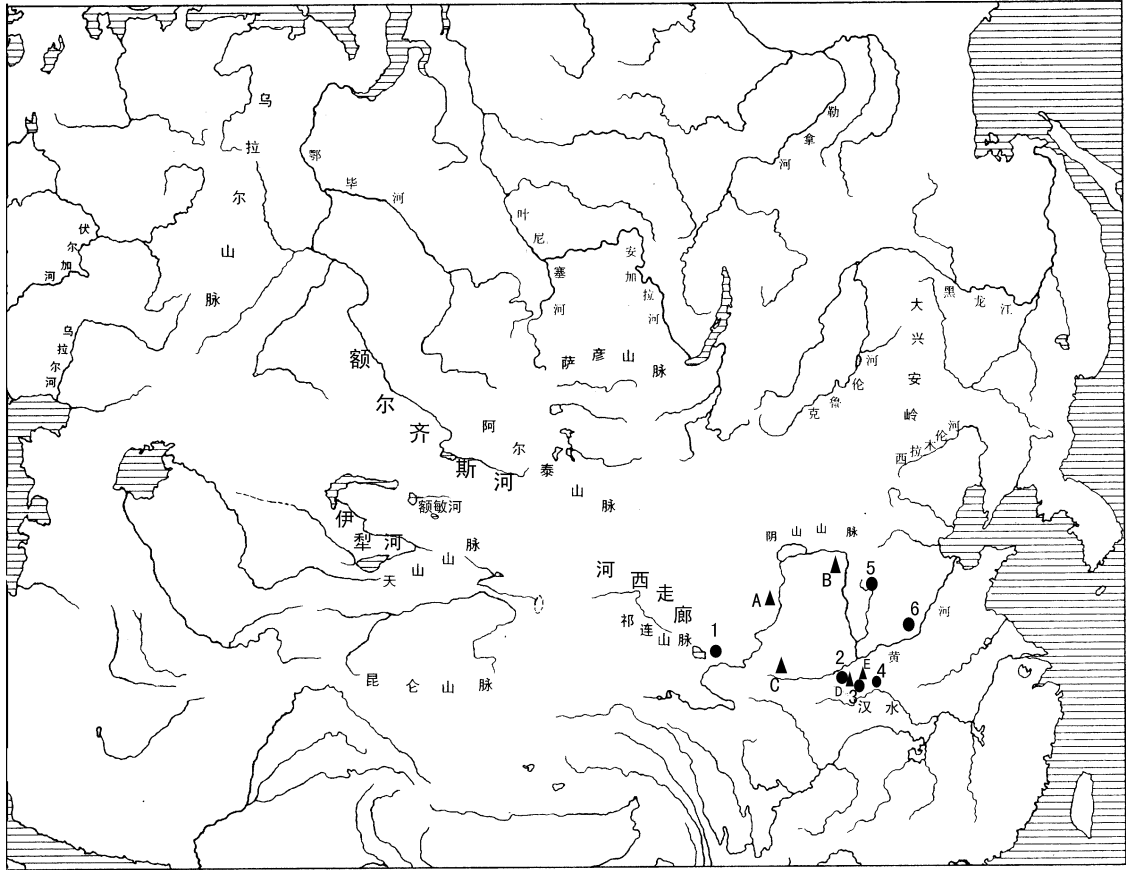
⁴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 3 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 280~284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

⁵ 尹盛平：《陕西陇县川口河齐家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5 期。

⁶ 刘士莪：《老牛坡》，第 35~5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第 276~279 页，科学出版社，2011 年。

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内部资料。



图六、塞伊玛-图尔宾诺倒式钩铜矛分布点及传播遗址点示意图

1. 青海西宁沈那 2. 陕西西安 3. 河南淅川下王岗 4. 河南南阳 5. 山西太原 6. 河南安阳
A. 鹿图山遗址 B. 朱开沟遗址 C. 川口河遗址 D. 老牛坡遗址 E. 东龙山遗址

五、余论

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是其文化代表性的武器之一，而中国境内的此类铜矛与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在形制特征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没有了尖锐的矛头，没有了窄小的矛叶，器形变得宽大圆钝。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是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表现出来的实用性的武器特征。换言之，中国境内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似乎已不具有太多的武器功用，而显然又不属于工具类和装饰品，很可能属于礼仪或仪仗性质的礼器。最近，日本学者松本圭太专文论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有銎矛，甚至认为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内，有銎矛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态有所变化，尺寸也越来越大，逐渐失去了工具还是武器的功用¹。无论如何，中国境内发现的此类铜矛显然已不具有武器的功用，很可能属于仪礼用品。

另外，形制特征上的较大差别也反映了这种倒钩铜矛并非长距离、跨文化的直接“舶来品”，而明显地是在文化逐渐传播、中转过程中加以改造、有所扬弃的“仿制品”。不仅仅是此类铜矛如此，李水城先生在论述整个西北早期青铜器时就认为中国西北地区对来自中亚及以远地区的冶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

¹ 松本圭太：《中国初期青铜器和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器群》，《中国考古学》第11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11年。

¹。

今天所言汉代以来的古丝绸之路，其实在史前时期已经存在，早期青铜器及其铸造工艺是当时文化传播和交流主产品之一。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从一个侧面印证的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及社会对于传入的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创造性的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并把这类青铜容器加入了“礼制”的内涵，成就了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礼乐文明。

附记：本文写作中与武汉大学胡保华老师多有交流，受益匪浅，在此致谢！

¹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